

铭恩说师尊

慈爱莫过维钊师

韩天衡

如果说其他老师待我像严父，陆维钊老师则更像是慈母。

我与陆维钊老师结缘是在 1963 年，那一年，西冷印社在停歇活动 14 年之后，恢复雅集，并迎来了建社六十周年的华诞。

这年，方介堪老师去杭州时，捎了我的一个印屏去参展。那时也很奇怪，不是西冷印社的社员也能参展。方先生回来后非常兴奋激动地对我说：“我的那些老朋友对你的篆刻非常欣赏，给予了你很高的评价，说你是未来的希望。”1984 年，篆刻大家唐醉石先生的公子唐达康写信给我说：“当时我父亲在你的印屏前站了很长时间，并说了一句话：‘二十年后，此人当是印坛巨子。’我父亲平时很少表扬人的，所以我特地记下了你的名字，如今果然被我父亲说中了。”我与唐先生素无交往，去年我去武汉办个展，见到了这件五十多年前的印屏居然就在唐公后人处。这是我最早的参加展览的印屏，是 1963 年 3 月的，我现在捐给美术馆的，是 63 年 12 月份贴的。

1963 年的夏季，我突然收到了陆维钊先生的来信，陆先生当时是浙江美术学院，即现在的中国美院的教授。信中说：“我在西冷印社看到你的印，从你的作品里面我们看到了希望。现在有些日本书家印人盛气凌人，非常狂妄，说我们中国的书法篆刻艺术已经落在他们日本人后面了。现在看到在我们的年轻人中，而且是从部队出来的年轻人中，出了你这么一个人才，令我欣慰。今后凡是有什么问题，你尽管找我，我会尽量帮助你。”信中还附了一张他的像小邮票般的肖像照片。当时的照片一般都是那样的尺寸，印大点的相片是很奢侈的事啊。

此后我就一直和陆老师保持通信联系，开始了函授式的交流。过一段时间，就把我写的字、刻的图章寄去。陆先生回信对我作品的优缺点都有具体而微的批改和评点。有一回给我回信，其中提到：“所惠印样似未有胜于前，其故有二。其一，旧刻功夫深了，有一匡子套住，不能脱却；其二，创新实践不足，未曾定型，显得写法、刀法皆有些心中无数。是以尚须多从实践中摸索出路来，不能求急于成就。”他还拿我的字和图章与老朋友一起探讨。有一次他跟我说，余任天先生看了我的字和图章，认为我写篆书将来未必有什么大成就，但写草书会有大成就。他将余老的意见转告给我，说供我参考。从中可见陆老师提携我的良苦用心，把我的未来当成他自己的希望，一如母亲对孩子的期望，殷切得很。

陆老师体态魁梧，而性情平和，说话慢条斯理，令你如沐春风，心绪松弛。但他对艺术的要求是严格的，很少当面表扬我。有一次他对我说：“天衡啊，全国各地都有人将刻的印章寄来叫我评价，我认为好的就留下，差的都扔进废纸篓。现在我翻了一下，你留下来的最多。”这算是对我唯一的一次褒奖。可是，他在朋友面前，透露出对我的特别情感。上世纪 80 年代，浙博的徐润芝先生就对我说，陆先生常对人说：“天衡是我的学生。”他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给别人的手札中这样写道：“韩君天衡治印极勤，每有所作，必以寄予，异日能自树立，可无疑也。”

1964 年我被上调到了上海东海舰队。有一天，营房来人对我说，你外公来看你了。我很纳闷哪来的外公，因为我出生前外公他老人家就仙逝了。我赶紧迎出去，原来是陆老师，他说我想起你来了，就来看看你。那时候打电话也不方便，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，但是冒着酷暑，走了一长段田埂路找到了我的军营，想想都不可思议。战友们谈起此事，我浑身满是幸福。

在与老师交往的 18 年里，我也常去杭州拜见他，因为路不熟，多是朱关田兄带我去他住的韶华巷。老师谈艺问道，兼及家常，非常开心，而且必定请我上馆子。即使后来他卧床不便行动，他也都是把钱交关田兄，让他陪我去饭店。我记得有一次是去杭州华侨饭店拜访他，那是因为 1972 年尼克松访华后，宾馆里都重新开始布置书画。那时候被请到宾馆里去画画，有空调吹，有抽水马桶，有大餐吃，这可是远胜过乾隆老官的生活啊。他边评价我的作品，边打电话给他的同学胡士莹教授——现在知道他的人不多，是写小楷的高手。胡教授来了后，陆先生说：“天衡啊，宾馆里的饭不好吃，我们上馆子去吃。”陆先生特地换上中式的细亚麻，两个老先生每人手里摇着一把折扇，居然陪着一个后辈到“楼外楼”打牙祭去了。

我曾看到份资料，说当年潘天寿先生请陆先生到浙江美院当书法系教授，陆先生说我是二流的水平，请我去似有不妥。潘先生说二流的水平也很好了。这是陆维钊先生的谦词，实际上他的书法、绘画、诗词、文章、印章，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，他绝对是一流的，而且是精擅历史、地理、哲学、戏曲和医学的通才。有一次和我聊天，他修地将自己和赵之谦比较起来，说：“字他不一定比我好，印我不及他，学问我不输

他，画我也能画。”不比今人，较量古贤，让我们看到一个严肃的艺术家，一个严肃的学者，总是在找历史上的高人作为较量的目标，这给我以很好的启迪。

陆先生为人相当谦逊，对学生如我也如此。有一次，单刀直入问我对他蝇扁体篆书的看法：“你看我这个字还有什么问题？”我说：“老师你的篆书是创造了自己的风格，只此一家，而且也已经写得炉火纯青了。”他说：“你好的不要讲，你讲讲你对我的字有什么看法？或者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？”我感觉到陆先生深深的诚意，于是说：“老师，如果你硬要叫我发表看法的话，我觉得您的螺扁篆书在结构的安排上还可以再自在些，有时候因过分强调疏密关系，显得有些‘做’的感觉。”话刚出口，我马上后悔于自己的胆大妄为，此时只担心自己的口无遮拦，得罪了老钊。可是老先生若有所思，深沉地点点头，还拍拍我的肩膀，看得出他一无恚色地进入了自省的状态，我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

陆老师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大著作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因为按照老一辈的传统，老师培养学生，学生的研究成果，都是以老师的名义发表的。他有很长时间做叶恭綽先生的助手，叶先生的许多著作，实际上大都由陆先生具体编纂的，署名的是叶恭綽先生。像这样的事例很多，比如方介堪先生花了十多年的精力编纂的《玺印文综》，最早稿本的署名是赵叔孺先生。又如高二适和章士钊，章士钊的《柳文指要》里面有不少文字是高二适先生撰写的。所以高二适有一封给我的信谈到：“毛、周已辞，行老亦已故去，《柳文指要》我补撰增加了一百多条，我想自谋出版。”尊师重义，也是往日的老例和古风。

所以陆维钊没有留下大本大术著作，这也反映出陆维钊先生的为人，是个非常传统、正派、厚道而淡于名利的学者。

记得 1978 年，浙江美院要招收书法研究生，年龄截至 40 岁以下，当时我 38 岁。我就和妻子商量，我这辈子就是喜欢艺术，当年我在国棉六厂 60 元的工资不拿，去当兵，每月拿 6 元钱的津贴。舍者有得，当兵十年确实给我向艺术转轨的机遇，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现着我的艺术大梦。退伍后原来想进专业单位的，但当时正处“文革”期间，被分配到自来水公司当秘书，不免心中耿耿，所以，想趁此招生机会去谈陆师的研究生，以求深造。

于是，我就到杭州，找到了负责招生的陆维钊老师。听完我的来意，他很惊讶地说：“你来读研究生？你来读什么？”不必了，你就这样继续搞下去就可以了。”

多年以后，我明白了先生的苦心，就像傅抱石、吴作人都是徐悲鸿先生发掘出来的人才并加以培养，徐悲鸿是识才、爱才的智者；而当年黄胄要去中央美院去读书，徐先生却不赞成，说你会已经形成自己的风格了，来了也许反而被学院派的东西给束缚住了。这就是大师的智慧和独到的眼光。陆老师也一样，我想，老师心里想的是：公车上充满着野性，是不适宜于“圈养”的。他不吸收你进校，让你放养，同样也是伯乐，一切都是为了让学生有更适宜的天地和土壤，得到更好的滋养和发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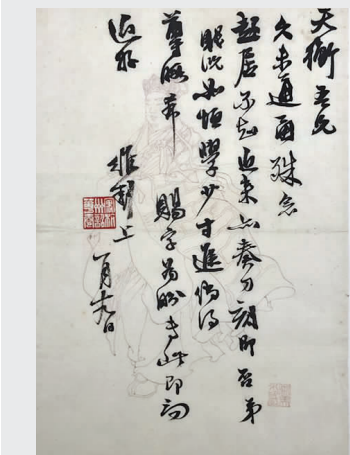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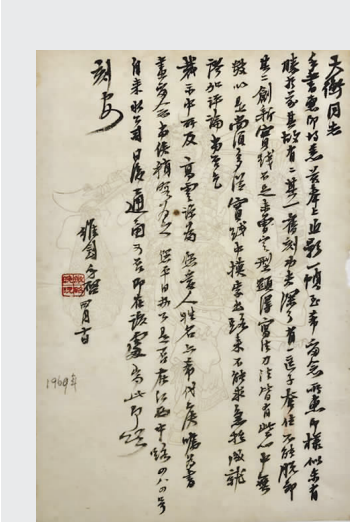
陆老师带研究生后不久，得了前列腺癌。有一次我去看他，他说：“我现在身体不好了，人又在杭州，能够帮助、指导你的机会不多了。所以我最近在考虑，托上海的老友郭绍虞先生来指导你。明天上午你来，我写封信交给你。”第二天我到了他家，老先生躺在床上，从枕边抽出封信说：“这封信你看一下，回上海后拿去交给郭先生，他和我几十年的朋友了，他会帮助你的。”那信封里装着用非常精妙工整的行楷毛笔字写的四页信笺，一是介绍我的艺和人，后面谈到自己的身体，说指导天衡的机会不多了，特地拜托老友在各方面给予指导，还谈到天衡不单单是个刻印的人才，是可以多方面培养的。其中有一句让我最感动的话，就是请郭先生能接受嘱托，“能帮助天衡的话，我感同身受。”“感同身受”这四个字，让我感受到了陆先生生如骨肉般的关怀与情感，当时捧着这封信，如同捧着陆老师一颗滚烫的挚爱之心。三十八年前，那铭刻肺腑的一幕，至今历历在目啊。

后来得知陆先生癌细胞扩散了，住进了当时还属于郊外的偏僻的浙江医院。1980 年 1 月的一天，我到了杭州，向郁重先生借生了辆自行车，去浙江医院看望他。当时买了几斤苹果，装在报纸纸的袋子里，自行车上也没有网兜，我就像演杂技一样，一只手持着车把，一只手托着几斤苹果。骑到洪春桥上桥时车子颠簸，包苹果的纸袋破开，苹果全掉在地上摔坏了。此时天色已晚，又是郊外，哀叹于无助和无奈，只能从地上捡起一个还算完整的苹果。到了陆老师的病房里，见他躺在床上，吃力地睁大两眼，满期待地看着我。我说：“老师我来看望你。”但陆老师此时已经

谈吐艰难，只见他眼眶里含着泪水，慢慢地朝我竖了下大拇指。此时无声胜有声，我理解了老师的心思，我说：“老师您放心，我不会辜负您那么多年对我的教育和栽培，我会努力的。”自以为坚强的我不禁也泪洒衣衫。

陆老师是德艺兼具的艺术家，与现在某些唯利是图，脑子里只想到钱的老师，有云泥之别。只要他觉得这个学生有才能，值得培养，就会不计报酬，呕心沥血地培养你。陆先生为我付出了近二十年的心血，我没给过陆先生一分钱。所以，我这辈子收学生不收费，也正是缘于对老师们无私栽培的一种回报。

陆老师一直关心我指导我，但我也有不听话的时候。1962 年方去疾先生看了我的印，对我说：“你可以变了。”这个“变”字如黄钟大吕，始终在我心中余音缭绕，对我的影响极大。我嘴上说我基本功还不够，但在心里始终回荡着这个“变”字。此后，我除了学习传统，便是思考探索如何去变，到 70 年代



上：陆维钊致作者信

右：陆维钊赠作者画《虚心》



冬瓜盅，这是广东菜中一个名牌，夏天吃最好了。

小时候能吃上一次冬瓜盅，是一种福气。冬瓜盅只能在馆子里吃，家里很难办。这个菜有派头，饭桌上端来一个冬瓜盅，大半个冬瓜，当中是山珍海味，多么壮观。

前些年去香港，在香港工作的孩子每与我上饭店，总叫一个冬瓜盅。我说两个人吃一个冬瓜盅，太浪费了，他说他一个人也吃一个冬瓜盅，有汤有菜，过饭。

冬瓜盅价钱可大可小，就看冬瓜盅里炖的是什么。里面可以有鱼翅鲍鱼海参等高等食材，也可以是鸡丁、火腿丁、干贝、冬菇丁、新鲜鲜心等。正是广东厨师创造出这么一个好菜，而且吃时还可以动手用调羹挖冬瓜肉，上面一层冬瓜肉挖清，就用刀割去上面的冬瓜皮，继续吃里面剩下的内容，再把冬瓜挖到底吃个精光。这样吃真挺热闹啊。

不过听说现在在香港不用自己挖冬瓜肉，是服务员用大汤勺给你挖，挖到挖不出，服务到家。

现在夏令时节，上海的新雅和杏花楼不知是否供应冬瓜盅？既是粤菜馆，这样的广东名菜，岂可不供应！大家不妨去看看他们供应否，享受享受冬瓜盅。

烧猪与烧肉

在广东烧味中，我最爱吃烧肉。当然，这是在我吃肥肉以后，我小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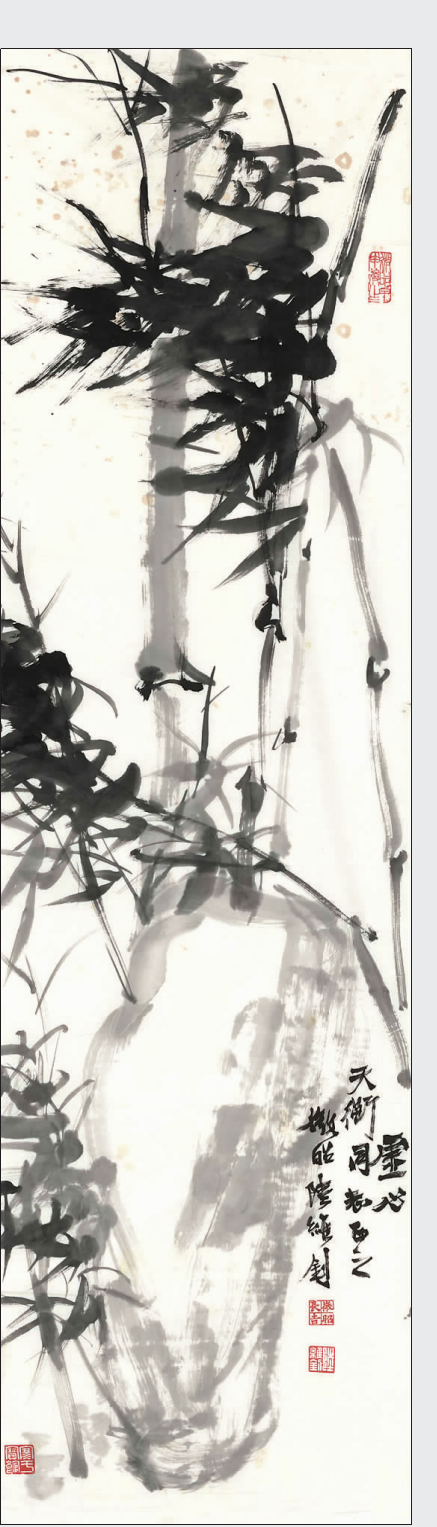
中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面貌。陆维钊先生写信给我说：“你刻的汉玉印，放在汉代的玉印中完全可以乱真，你为什么要去变呢？”老师是好心，是爱护，怕我前路崎岖坠入歧途，我没有和他争辩。不久，我在一方印边上刻了四句话：“秦印姓秦，汉印姓汉，或问余印，理当姓韩。”也算是对于保守、敢创新的老师的一个回复吧！

所以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，创新的这条路还是一定要去的。不是虚无主义地抛弃传统，蔑视传统，恰恰是要敬畏传统，吸吮沉淀而富有营养的乳汁，在认真借鉴传统的基础上，争取走出前人没有迈出的半步到一步。

科学技术和艺术不一样，科学技术可以像孙悟空一样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，所谓一飞冲天。艺术上没有一个人，乃至一个时期内敢豪迈地佐证：一个跟斗真正地翻出十万八千里。艺术这条历史长河，就是靠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，一浪推一浪，开拓绵延积累推进的。所以文化的创新较之于科学的创新来讲，一个是喷气式登天，一个是龟息爬行，各具规律，不能攀比，不必攀比。我始终感到，我们这些搞艺术的后来人，虔诚地、认真地敬畏、借鉴传统，在传统万岁的基础上推陈出新，你能够加上新的一天，或者讲得大一点加个一岁，可谓幸甚至哉。我们应该放怀仰望九天，但更需脚踏实地循序践行！

二〇一七年元月九日

改定于海上豆庐



说冬瓜盅

（外二则）

任溶溶

记得外国罗宾汉等绿林人物也烤猪吃，可是没有我们的调料，味道怎能跟我们的烧肉比呢！

叉烧包

好多年前我学俄文，俄罗斯老师登门教我。有一次我招待他吃广东点心。他拿着个叉烧包边吃边赞不绝口，只是奇怪，包子是咸的，怎么面粉皮子甜咪咪的。最后他自己笑着说，没错，咸中带甜，甜中带咸，这就是辩证法。

广东是后进的地区，有许多东西应是学习外江省份的。包子恐怕亦然。包子最有名是扬州包子，广东点心师傅学做包子一定学扬州吧？可是你把叉烧包和扬州包子放在一起，真是大不相同。这就说明广东点心师傅的创造性。

不但叉烧包，试比较广东蛋挞和葡国蛋挞，广东鸡批和外国鸡肉煎饼，完全不同，可是广东师傅连名称都不改，介绍过来又改造了。蛋挞的 tart，鸡批的 pie，不是外国学的音译吗？

韩国外国语大学龙仁校区，在该市下辖的慕贤面，“面”是韩国的行政单位，相当于镇。慕贤四面环山，空气清新，也免不了有些孤寂。二月底过来的时候，那些山还是一片苍褐，盖着薄薄一层积雪，寒鸦在林梢盘旋，不时蹲在枝头，对着我呱呱乱叫。待我安顿妥当，慢慢熟悉了周围的环境，它们也渐渐朗润起来。在迎春星星点点的酝酿中，春拉开舒缓的前奏。一天推开窗，忽见大片红云喷薄而出，在山间迎风摇曳，是金达来，一夜间把整个春天点燃。然后是满园樱花，璨霞粉雪，汪洋恣肆地登场，又淋漓浩荡地倾落。渐渐红稀绿肥，不知不觉间，眼前已是夏木阴阴……

李翰

易受到感染。只是到了晚上，青灯冷案，又无法消极怨艾。广圩是长江的一处圩堤，学校离江边很近。静寂的夜晚，每每会传来轮船的汽笛，或在我温书的当儿，或在我枕边轻唤。对我来说，汽笛是未来，是远方和希望。曾于淡月微云之夜，循着汽笛声，骑车追到江边。只见江心一艘大轮，足有四五层楼高，灯火辉煌，在船头划开一条绚烂的光带，浪花欢快地向前跳跃。不远处的长风帆，我在李白的诗中读过：“相迎不道远，直至长风沙”，再前面是芜湖、南京、上海……这一路炫惑的梦之城啊！随着一艘灯火，花一样在我的想象中绽放。轮船渐行渐远，唯余零星光点，旋即消失在黑暗中。江水像怪兽一样吞噬着天光和月色，乌压压在脚下翻滚。黑寂的空气中涌动着无边的凄惶，让我沮丧和惶恐，轮船在视野之外，再度传来呜呜笛笛，又燃起几点憧憬的星芒。

青春涌动着梦想的血脉，世界那么大，我一定要看看。还记得初中时某个暑假去了一趟合肥，回来兴奋了半个多月。作文也有了丰富的素材，为了少年那一点虚荣，又额外虚构了九华山和武汉。在少年的眼里，九华山和武汉是多么遥远而神奇的存在。扬子江的汽笛，一听数年。终于又得以背起行囊，只是载我远行的，是呼啸的列车。长江客运当时已经取消，那悠长空旷、浑厚沧桑的扬子风管，永成绝响。

列车呼啸而过，远方已不再遥远。十多年书囊囊零，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。桂林、西安、北京、长沙、武汉、重庆……少年时遥远而虚渺的想望，现在触手可及。更远的地方，波音飞机张开硕大的翅膀，也能随时拉到眼前。海峡的对岸，大洋的那一头，都从地图上的圈圈点点，变成目睹身临的土地和山川。远方在不绝的跋涉和叩问中，逐次揭开神秘的面纱，却在心底无处安放。时光的碎屑无从清空，总会把新鲜的风物做旧。“我面前是妖娆的夜色，我的眼中看到却是寂静的水乡”，当年看黄磊和刘若英主演的《似水年华》，被这句独白莫名打动，若干年以后，才品出其中味道。也许，那一夜扬子风管，那一抹苍天余霞，那些看过的风景遇到的人，在时间的这一头，才是远方。

八月的校园空空荡荡，大朵大朵的云，大片大片的草地，连绵不绝的群山，仿佛都属于我，还有上下翻飞的鸟儿。广圩中学的暑假，差不多也一样空空荡荡。不过，那时的我，茫然失措，无心理会那空荡中还有风声鸟语、天光云影。记得父亲有一次出差，顺道来看我，一下子就喜欢上那里。他说那安静、简朴，房子修整一下就好，跑去门前的杂草，还开一畦菜圃。二十年过去，走到父亲的心境，父亲却走到了另一个世界。

窗外鸟儿叫得格外欢畅，平日常女学生叽叽喳喳，把它们压抑得太久了吧。韩语听不懂几句，但这大自然的的声音，风吟水语，虫嘶鸟鸣，却都是我熟悉的语言。时光那头的少年，作文有限的虚构，如何也想不到这东海边的半岛，想不到几十年后，我在这半岛的某个角落，已饱看一轮山色黄回绿转。时光这一头的我，从窗外看过去，看到慕贤的草木和群山，也看到几千里外，龙眼山那一抹青苍，我还看到那个少年从作文中走来，那个青年从小路上走来，走到我身边。

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”，这是当下火遍网络的小资必读，更撩拨着一茬又一茬文艺青年。待那文艺青年挤上又挤下西行的列车，待那川藏路上的高原红褪却脸颊，那些无数通向远方的站台和空港，兜兜转转，又回到出发的地方。

于韩国·龙仁